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

的现代建构

ZHUANGZI DE GUDIAN XINYI YU ZHONGGUO MEIXUE
DE XIANDAI JIANGOU

侣同壮

著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

主编 蒋述卓 刘绍瑾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ZHUANGZI DE GUDIAN XINYI YU ZHONGGUO MEIXUE
DE XIANDAI JIANGOU

侣同壮 著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

主编 蒋述卓 刘绍瑾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侣同壮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7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0671 - 0

I. ①庄… II. ①侣… III. ①庄周 (前 369—前 286) —美学思想—研究
②美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83 ②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873 号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著 者: 侣同壮

策划编辑: 史小军

责任编辑: 李 艺 刘 曦

责任校对: 刘 璇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82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性的策动下，我国文艺理论、美学界出现了观念多元化和形态多样性的发展态势。怎样建设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文艺美学新形态，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更成为文艺理论界两大关注焦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论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运用中华民族自身的文论传统资源作为内在的基础和文化命脉，面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强的现实语境，处理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出既有现代思维高度、又具有民族性的新的文论形态。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有些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总体来看，更多的是宏观上、倡导式的，在理论方法上兜圈子，鲜有把那些意识和方法运用到文论、美学建设的实际中的扎实之作。

因应理论上的挑战和学术界的趋势，我们较早地进入了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在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蒋述卓、刘绍瑾、程国赋、魏中林等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一书。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人的文艺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这种“当代性”内涵只有在不断的历史阐释活动中才能展现出来。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正是在现代学术规范、现代文艺思想的“当下视阈”中对古典文论文本的阐释过程。这一阐释过程体现出来的也正是“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的“视界融合”。20世纪的学术史，不是对过去的研究历史的简单追述，而是对

2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学术转型时期学术思想、学术理路的反思，从那段学术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能预测未来的可能方向。

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上，我们在2005年，由蒋述卓教授领衔，以其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的身份，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个重大项目的结题成果。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这套丛书从古今对接、中西对话的宽广视野，深入探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和当代意义，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参与现代文艺理论建设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以这一主题为中心，通过整体考察、专题研究、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把历史沉思与理论探究结合起来。具体来说，该丛书以如下四本论著来展开论述：

其一，《古今对话中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这是撰著者蒋述卓、刘绍瑾近年来对他们赖以起步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所涉及课题的理论反思和方法建构，主要探讨了实现古今对话的基本途径，从学术史上回顾了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化历程，并从文化视野上观照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民族精神。我们主张以开阔的比较视野和对话意识，立足本土，探寻中国文艺美学的“源头活水”，超越中国当代文论的无根性危机。只有获得了深厚宽广的本民族母体支撑的思想文化建设，才能获得精力弥满、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该书为本丛书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和理论视阈。

其二，《通向现代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该书是蒋述卓、刘绍瑾近年来自己撰著或组织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完成的一部富有特色的古典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著作，主要研究现代文艺批评、现代文艺美学建构中存活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概念、术语，分析它们的古典意义及其在现代的生成、延展甚至误读。古典美学范畴研究成果斐然，但走出围墙、打通现代的范畴研究，则是本书的一种新的尝试。从20世纪20年代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到50年代开始提倡的“古为今用”，再到90年代热炒的“现代转换”，这方面的理论、方法提出了不少，但现在最需要的是扎实的、具体的实践。在现阶段，一些畅谈中国美学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的宏观论述固然有其价值，但从问题、范畴、概念入手，探讨其古今对接的可能性的具体个案研究，尤为需要。通过这一系列走出围墙、打通

现代的范畴研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那种一以贯之、生生不息而又不断创新的精神，于斯可见。

其三，《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该书由李凤亮教授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主持撰写，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海外华人学者在中西、古今对接上的经验，为我们思考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学界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大陆文艺理论界的实践和经验作为总结对象，而忽略了海外。海外华人学者（含在海外求学且经常往返海外的台港学者）作为一种学术群落，其文化身份之于中国传统，具有“自我”与“他者”、“看”与“被看”兼而有之的色彩，具有与纯粹的大陆学者不同的文化立场、思维方式和阐释视野。他们往往“置身于”西方文化中心和最新文艺理论思潮的“现场”，吸收并参与这些理论思潮的起伏与讨论，但同时又始终不忘对中国传统的“根”的体认和再造。这样，他们就能把中国古典诗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放到中西比较的大视野下，以西方最新的理论为参照进行开掘与阐发。这样的结果，不仅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世界意义和价值，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

其四，《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该书由侣同壮在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是一个古典文艺美学现代生发的个案研究。该书系统研究了20世纪的庄子美学研究与阐释，着力探讨古典的庄子怎样通过现代阐释进而参与到中国美学的现代进程中来。通过对这一在古典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传统文艺美学个案现代生发的考察，揭示出古典向现代转化及重新生成的价值意义与实际可能。“古典新义”一语采自闻一多《古典新义》一书，不仅意在提示闻先生及其前辈先贤对庄子美学现代阐发的开创之功，也隐然展示了该著作者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开拓的用意和雄心。

刘彦和曾言为文之用心：“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毋庸讳言，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现代价值的发掘、现代文艺学建设中传统文论的参与，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又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其说它是目的，不如说是过程，是一个丰富的、具体的、鲜活的展开过程。实现中国文论的古今对接、揭示古典文艺美学的当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强调新世纪中国文艺美学建设返本

4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开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我们的一种努力方向，但这一方向更应凸显其开放性、进行时和多元途径。考虑及此，我们这套丛书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许会成为学界同仁深入肌理、探骊得珠的引玉之砖了！

最后，本丛书的立项与写作，得到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及谭好哲教授的支持，在此特致谢忱！同时，本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建设项目“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资助。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史小军教授、本丛书的责任编辑李艺女士，都对该丛书的出版付出了智慧与辛劳。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上述各位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蒋述卓 刘绍瑾

2012年2月10日于暨南园

前言：庄子美学的百年历程

对庄子思想的阐释，自晋代向秀、郭象以来，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古典时代或以玄解庄，或以儒评庄，或以佛注庄，庄子的意义不断得到新的生成和发展。进入 20 世纪，庄子这一“古典”又获得了一种“新义”——美学。本书题目中所用的“古典新义”即取自 1948 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一个类目，其意盖为以新的眼光烛照古典，俾其焕发新的意义，闻一多所写的关于《庄子》的一段话就分明透露了这层意思：“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①“古典新义”其实并非闻一多的原话，而是朱自清所加，但这种称谓无疑十分契合闻一多的此类研究。以新的标准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素来是朱自清躬身实践的，所以“古典新义”也可以视为朱自清与闻一多的知音之言。以美学的眼光观照庄子，也使古老的庄子透显出了新的光彩。

说庄子思想是美学，并不在于庄子美学与西方美学的相似或相合，而主要在于庄子所谈到的人生修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学和艺术的创造，深刻地启迪了文学和艺术理论，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审美心态。如“虚静”、“心斋”、“坐忘”等修养功夫实契于后世文艺欣赏与创造者的心理特征，“象罔得珠”的寓言形象地标画出艺术心灵的非功利特点，“指与物化”的说法则对艺术技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自然”、“天”、“真”等一直是后世文艺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文艺理论家一直高倡的美学原则，《庄子》传达出的时空观也为后世文学和绘画提供了迥异于西方的美学视点。所以，庄子美学实是一种美学精神，是庄子的言论向美、向艺术生成的巨大

^① 朱自清等辑：《闻一多全集·乙集·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 1948 年版，第 282 页。

2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可能性。徐复观认为庄子的美学精神是“中国艺术精神主体”，其与西方美学所呈现的艺术精神“在若干方面，有不期然而然的会归”^①，实乃深得“庄子美学”之意趣。正是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会归”使庄子思想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西方美学的一种“期待视野”，从20世纪初中国学人对西方美学的初步接受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庄子思想都在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一方面，庄子思想借不断演进的西方美学的触媒不断地生发出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庄子思想所形成的期待结构一直贯穿于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中，成为一条重要的纲维和线索。展开一百余年来庄子美学发展的历史图卷，不难发现庄子美学思想生生不息的生命符码。

相应于一百余年来风云变幻，庄子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大致呈现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世纪前50年

这一阶段，庄子美学思想基本上处于一种“潜研究”状态，即庄子尚未作为独特个案受到系统的美学发掘，主要表现在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在对西方美学、文艺思想引进与阐发的过程中，并非刻意地与庄子思想相印证从而形成的庄子思想的美学转换。他们的筚路蓝缕之功虽然没有完成中国美学的体系性构建，却给后来学人启示了一种研究路向。另外，一些文学批评史著作对庄子文艺思想的论述也透露出庄子研究的美学信息。

王国维是较早接触西方美学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诗文中经常化用庄子的语言，思想上也与庄子有几分接近。其《人间词话》“境界”说的“真”观念与主要发源于庄子的“真”的美学理想有一种潜在的继承关系。王国维倾心于叔本华的“理念”论，但他对“理念”论的接受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美学资源陶养而成的“前理解”基础之上的，其中对庄子“真”观念的潜在继承即是一个重要方面。鲜有人注意到，王国维的画论也包含有对庄子美学精神的理解。鲁迅与庄子的关系因他对庄子之“毒”的疾视而广受关注。其实，鲁迅有对庄子的批判，也有对庄子的顺承。他不但常使用庄子的语汇，而且思想上也能见出庄子的影响。就文艺观念而言，他的“纯文学”观就与庄子的“无用之用”说有渊源关系，只不过没有吸收庄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子“无用之用”的“逍遥”本旨，仅汲取了“无用之用”的语言逻辑；鲁迅“心”的文艺观对庄子思想也有一种潜在的继承。郭沫若也在不少地方曾明确表示过他喜欢庄子，因而“郭沫若与庄子”的关系也颇受学界瞩目。“泛神论”、“文艺的非功利观”、“自然流露”说等方面均能见出郭沫若与庄子的渊源。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与庄子的关系中开出了一块王国维、鲁迅都未曾着意的领域，即有意识地将庄子与现代美学、文艺联系起来。王国维、鲁迅虽也多有提及庄子，但在美学思想方面对庄子的继承多因我们的阐发而显，他们并没有主动地将他们的文艺、美学观念与庄子思想结合起来，所以庄子美学精神在王国维、鲁迅身上的延续可以说是庄子美学在现代的“潜运”。郭沫若以“泛神论”称述庄子，把庄子的“没功利心”称为“艺术的精神”，并将这些认识融汇到文学创作中，实际上把庄子美学这股潜流引出了地表。当然，相对于后来学界对庄子美学的专门研究，郭沫若此举也仅仅是提供了一种信息。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同庚同寿，他们有很多的相似点，如在中国现代美学界的声望均颇为隆盛，他们的美学观念都与庄子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也都曾明确地将庄子思想融汇到现代美学视野中来。朱光潜以老庄道家思想阐释他从克罗齐那里得来的美学核心观念——“形象的直觉”，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美学中国化了，而“形象的直觉”与庄子的美学观念更为契合；兼容中西美学理想的“人生的艺术化”也能在庄子“鱼相与忘于江湖”的隽语中找到价值皈依。宗白华注重在中西比较中对国绘画理论的整理与阐发，而庄子美学实是后世艺术表现及艺术理论的源头，宗白华美学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庄子思想的底色；中国绘画“静”境的达到与“空白”的运用也都是从庄子那里得到了深刻启示。

文学批评史方面，先后有陈钟凡（1927）、郭绍虞（1934）、方孝岳（1934）、罗根泽（1934）、朱东润（1937）、傅庚生（1946）（以初版时间先后为序）等六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行世，而只有郭著和罗著较为明确地提到了庄子。然就郭、罗两位的论述来看，他们所引庄子的原文大致相同，但观点有所差异：郭论由“自然”而言“神”（“神化”、“神遇”），并认为“神”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评；罗论亦重“自然”，其所谓“艺术创造论”其实与郭之“神化”论并无二致，只是在“艺术创造论”之外又加了“写作方法论”、“书文糟粕论”，前者以“虚构”名《庄子·

4 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寓言》篇所说的写作方法，后者则着实与郭著论鉴赏时所需的“神遇”态度唱了反调。此外，初版于1939年的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不仅有专章“老庄底艺术论”，而且在有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潮史著作中，最早以南北文化之不同、浪漫和现实之分野来标示道、儒之分野，强调南北文化、儒道思想这一“奔进于中国文艺根底的两大主潮”^①。另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②，这期间以“老庄”名篇的文艺论文仅三篇，即杨树芳的《老庄思想与六朝唐宋文学之影响》（《协大艺文》1期）、陈东阜的《老子庄子文艺思想》（《庸报》1941年2月14日）、李戏鱼的《老庄的思想和艺术理论》（《自强月刊》1卷第3期）。

20世纪前期对庄子美学的研究虽然基本处在发轫阶段，且缺乏系统的观照，但它所起的作用丝毫不能忽视。可以说，它给后来的庄子美学研究造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庄子美学在后来正常的学术研究中一直被置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相应地，在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中，庄子代表的道家美学所开启的美学维度也是其他各种美学流派难以匹敌的。

（二）第二阶段：1949—1978年

这一时期的庄子美学研究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分途，大陆为一脉，港台及海外华人学界为一脉，但没有并进。大陆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对庄子基本采取了否定的评价，除了几本文学批评史之外，对于庄子美学思想的研究大致阙如。港台及海外学界则接续了前五十年的传统，并据其中西学术前沿的优势将庄子美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大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共有四本，郭绍虞的改编本、罗根泽的再版本（包括从未出版的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另有两本新著——黄海章著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除罗根泽的再版本外，其余三著都习染了时代色彩。郭著首先确定庄子的“唯心论者”身份，而对其文艺观点的肯定似乎成了“余事”，他历来称赏的“神

^① 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10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化”境界也要竭力以实践的观点破除“神秘”性。刘著首先指出庄子的“反文艺”特色，但亦能做到辩证地看待，肯定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神化的境界”一论与郭著大同小异，“浪漫风格的表述”算是特殊之处了。黄著论述较简，没有提出新异的观点。这一时期只出现两篇有关散文的论文：邹云鹤的《试论〈庄子·内篇〉散文的艺术特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胡念贻的《论庄子的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

港台及海外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位对庄子文艺思想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徐复观和叶维廉。这两位学者国学基础均比较深厚，又具有相当的西学视野，他们采取比较的方法论似乎已成必然。徐复观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以近百页的篇幅专论庄子，并与西方诸多哲学、美学家如康德、卡西尔、海德格尔等作了沟通参证，特别指出了庄子的“心斋”与审美心理学及现象学的汇通。叶维廉尽管没有许多专论庄子的文章（《道家美学论要》是比较著名的一篇），但其比较诗学中具有浓厚的庄子情结。在叶维廉这里，现象学与庄子的比较更为深入，他拈出“真实世界”一语作为连接二者的媒介，并通过这一媒介论证了中国古典诗学通于世界的可能。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虽没有像叶维廉那样特别看重庄子，但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也论到了庄子思想与现象学的相通之处。

这一时期，台湾尚有一批学者从其他角度将西学与庄子相比较。施友忠的《从文学批评观点读庄子》（《中外文学》1974年第3卷第7期）把庄子与浪漫主义批评家华兹华斯、拜伦的某些说法以及他所说的黄唐主义者（primitivists）相类比；古添洪的《直觉与表现的比较研究》（见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以克罗齐直觉与表现的观点阐释庄子谈艺的寓言；陈慧桦的《庄子的词章与雄伟风格》（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认为《庄子》的词章体现了西方美学上所称的“雄伟”（sublime）风格；华谷月的《人生八苦，等待唯空——探〈等待果陀〉》（《明报》月刊1970年第5卷第7期）和胡菊人的《浅谈荒谬剧与道家思想》（《现代文学》1977年复刊号）则沟通了《庄子》与西方荒诞派戏剧。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极大地拓展了庄子美学的理解空间。

（三）第三阶段：1979 年以来

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华人学界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分离之后终又走向了合流，但这种“合流”只是就庄子美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广度及自由度而言的，而并非研究方法与视域的全方位重合。事实上，由于政治形态、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大陆与港台及海外华人学界仍保持了各自一定的特色。

大陆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庄子美学思想研究的勃发期，压抑了许久的学术热情于此间找到了突破口，加之西学汇入与激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考量这一阶段，则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1.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这是“拨乱反正”期，通过论辩，基本上能够辩证地看待庄子及其学说，而不是简单地冠以“唯心主义”、“虚无主义”的定评了事。这种学术现状自然为庄子美学思想的研究开了绿灯，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和张少康的《先秦诸子的文艺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可为代表。

2.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

这十余年的庄子美学思想研究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其一是美学热对庄子美学研究的促发。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升温的美学热于 80 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产生了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两个重要成果，二著都有相当的篇幅论述庄子。其他一些单篇论文如樊公裁的《庄子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81 年第 9 期）、陈约之的《庄子谈艺言美》（《文学评论》1982 年第 1 期）、张文勋的《老庄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8 辑）、吴调公的《庄子美学思想平议》（《人文杂志》1984 年第 3 期）等也能体现这一热度。其二是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1987 年在大陆的刊行。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理解在当时的大陆学坛颇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广受大陆学者欢迎，时至今日，其影响越来越显著。

3.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这一时期难以找到标志性事件，因为庄子美学研究走向了多元发展，走向了全面繁荣。存在论美学、生存论美学、生态美学、审美文化等都在

庄子这里找到了落脚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9年以来的三十余年时间，庄子美学研究可谓全面丰收，主要表现在：

1. 论文数量急剧增多

粗略算来，以“庄子”、“庄周”或“老庄”名篇的美学论文有700余篇，这还不包括以“道家”名篇的美学论文，大大超过了此前80年相关论文的总量。其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论文数量即轻取了这一时期论文总量的半壁江山，盛况可谓空前。

2. 中国美学史著作的普遍重视

20世纪80年代，自《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史大纲》问世以来，中国美学史就在不断地重写，如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周来祥主编的《中国美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皮朝纲主编的《中国美学体系论》（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法的《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07年版）等等，这些美学史论著都对庄子美学给予了充分关注。另外，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如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蒋凡、郁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也都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庄子，肯定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3. 出现了若干专著

专著的出现最能体现学界对庄子的重视程度，也是“成果显著”的重要表征。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作为第一部庄子美学研究专著于1989年问世，此后，庄子美学研究专著便不断涌现，张利群的《庄子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安苓的《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庄子思想与中国艺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阮忠的《庄子创作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陶东风的《超迈与随

俗——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涂光社的《庄子范畴心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包兆会的《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徐克谦的《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中华书局 2005 年版）、时晓丽的《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杨鹏飞的《庄子审美体验思想阐释》（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王焱的《得道的幸福：庄子审美体验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郑笠的《庄子美学与中国古代画论》（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等对庄子美学思想给出了多种角度的阐释，丰富了庄子思想的美学蕴涵。

港台及海外与前期没有明确的分界，亦没有较大的波动，可以说是平稳地将研究推向繁荣。其表征之一亦如大陆，出现了若干专著，如蔡宗阳的《庄子之文学》（文史哲出版社 1983 年版）、颜崑阳的《庄子艺术精神析论》（华正书局 1985 年版）、郑峰明的《庄子思想及其艺术精神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1987 年版）、朱荣智的《庄子的美学与文学》（明文书局 1992 年版）、董小蕙的《庄子思想之美学意义》（学生书局 1993 年版）等。亦有一些学术论文及学位论文涉及庄子的文艺思想，如田兆文的《寻觅“道”的踪迹——论庄子美学的终极思想》（《中国文化月刊》1979 年 1 月）、奚密的《解结构之道：德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见郑树森编《现象学与文学批评》，东大图书公司 1984 年版）、邱琼慧的《庄子“道”的艺术宇宙观之呈现》（《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4 卷 76 期，1991 年 3 月）、高柏园的《庄子思想中的唯美性格》（《鹅湖月刊》221 卷 1 期，1995 年 7 月）、郑伟明的《由庄子的“心斋”“坐忘”论创作时精神状态》（《国教辅导》32 卷 6 期）、郑世根的《庄子美学之先决问题及其审美范畴剖析》（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年）、林翠云的《庄子“技进于道”美学意义之探究》〔（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2 年〕、李宣洵的《庄子的生命理境及其艺术精神》〔（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 年〕等等。这一时期，徐复观、叶维廉仍持续着他们的影响，他们就像两座并峙的高峰，一时难以逾越。

综观 20 世纪以来的庄子研究，庄子美学意义的生成都是在中西互通、比较中实现的，中西比较构成了庄子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 20 世纪整个庄学领域的一大景观。庄子美学意义的发掘，原其初，动因在西方美学

的传入。台湾学者丁履谦认为：“在老庄的书里，找不到对艺术此一事实的正面的肯定。于是，他们对美学的理论的层面，只作了比喻性的透露，有待于读者对庄子一书作侧面的或隐然的体悟。”而“这一体悟和把握，实有待于对现代西洋美学的会通之后，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换言之，对近代西方美学思想的了解，有助于对庄子艺术精神的阐发”。^①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一部庄子美学意义的生成史，几乎就是西方美学与庄学相互比较阐发的历史。庄子美学研究的“潜运”时期，庄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并不自觉，较多的情况是中国学者依据本土文化形成的“期待视野”接受、融汇西方美学观念。在这一交融过程中，中国学者对庄子思想与西方美学的沟通不是十分明确，很多时候要靠后学们探颐索隐才能发现。20世纪后半期，庄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才进入了“自觉”期，庄子与西方文论、美学的参证、比较、沟通可谓随处可见。谈“自然”，有人把庄子与现象学沟通；言“虚静”，有人联系到“距离”说；说“言意”，则有人生“语言学转向”之联想。还有一些以浪漫主义、悲剧美学冠于庄子的论家，无不以西方概念为依据。西方自古希腊至近现代的诸多文论家如柏拉图、卢梭、席勒、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伯格森、海德格尔、卡西尔、马斯洛、德里达等，几乎都可以在庄子这里找到印证。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比较似乎把庄子思想搞得支离破碎，其实并非如此。比较的进行拓展了庄子的诠释空间，广泛的比较也充分说明庄子美学思想具有极好的穿透力，是中国现代美学不可或缺的一维。

所有的中西比较中，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意义。徐氏论庄子美学，不是在庄书中有关美、艺术的只言片语上做文章，而是认为庄子的“道”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他进一步指出“庄子所体认出的艺术精神，与西方美学家最大不同之点”，“乃是庄子系由人生的修养工夫而得，在一般美学家，则多系由特定艺术对象、作品的体认，加以推演、扩大而来。因为所得到的都

^① 丁履谦：《美学新探》，（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是艺术精神，所以在若干方面，有不期然而然的会归”。^① 徐复观把握庄子文艺、美学思想的方法，开启了庄子美学研究的新路径，在台、港、海外华人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大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庄子美学研究。不知与徐复观的著作有无接触，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发表了《漫述庄禅》，文中提出了“庄子哲学是美学”的著名论断。李氏指出：“从所谓宇宙观、认识论去说明理解庄子，不如从美学上才能真正把握庄子哲学的整体实质。”这既是对庄子的一个新解读，更体现了把握庄子美学的新方法。徐复观和李泽厚的论述引领了一种路向，即必须从庄子本身的特点，从哲学与美学、人生与艺术相通的整体上去把握庄子美学的意义，而不能执泥于西方美学、文论的概念系统。这种路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基调，研究庄子美学必须尊重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不能简单地执“西”驭“中”，裁剪、割削庄子的文化属性。

我们应看到，一百余年来的庄子美学研究并不纯然是个体性事件，而是始终与中国美学这一整体发生着紧密联系。王国维、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对庄子思想的阐释连动着他们整体的美学思想，而他们的思想无疑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庄子美学思想获得了系统的阐发。作为“源”，庄子美学从来不是孤立的，总是与“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积极地融入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儒道两家同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显胜于道家，而在美学研究方面，庄子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儒家，中国历史上没有人像庄子那样受到现代美学家如此的眷顾。庄子在中国美学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源”，他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美学的一个基础，这一基础的形成离不开王国维等现代学者缔造的现代庄子的美学传统——非功利美学观。尽管现代学者对庄子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与发掘，但在非功利这一点上，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了庄子思想与西方美学的契合。这种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一个逻辑基点。所以，王国维等学者对庄子的阐发虽然不系统，但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探索方面更为重要。我们把主要的篇幅放在他们身上，以证明庄子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28、79 页。